

中国历代演义之三

兩晉演義

上冊

蔡東藩著



2 039 9598 0

中国历代演义之三

兩晉演義

蔡東藩著



2 039 9592 6

中国历代演义之三

兩晉演義

蔡东藩著



中国历代演义之三
两晋演义
(上下册)
蔡东藩著

江苏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印1/32 印张 21 15/16 版2 字数 546,000
一九六三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制
印数 1—30,000

重印说明

『中国历代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十一部演义，是蔡东藩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間写成的。作者采用演义体裁，把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到一九二〇年两千多年的大事，作了通俗系统地叙述，内容丰富，所取史料多有依据，可供读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参考。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部『演义』是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写的，书中主要描写了帝王将相的活动和宫廷内部的纷争，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与生产斗争，有的很少得到反映，有的作了歪曲和诬蔑；有不少地方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不正确的，甚至对于兄弟民族还加以诋毁；另外，书中有许多地方，并作了庸俗的描写。希望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去读它。

本书是根据解放前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的本子重印的，重印时，只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其余一切照旧。另外，我们请柴德赓先生写了『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一文，对本书内容及其作者作了评介，印在卷首，供读者参考。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

柴德慶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非常丰富，单是一部廿四史就有三千几百卷，其余的史书更不知多少倍于此数。在史料丛杂、头绪繁多的情况下，学者虽穷年累月，未必能尽读这么多的书；就是读了，这些书本身的错误不少，亦未必都有用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几部史实可靠，观点正确，既有系统，又有重点的通史，让大家对祖国的历史有个共同的正确的认识。这方面工作正在有领导有组织地集中专家的力量积极进行，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不过，历史知识的传播，不是一种、两种体裁或一部、两部著作所能全部担负的。体裁不同，内容便受限制；对象不同，要求随之而异。作为一般干部和学生的历史读物，既要有丰富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也要文字生动活泼，才不致阅不数卷便打呵欠。因此目前迫切盼望多出些通俗历史读物，来满足这方面读者的需要。这种读物的编写工作也要有领导，有组织，既要明确对象任务，又要集合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能完成的。象近年连续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这方面目前仅仅是开始，工作当然是繁重的。

至于长篇的历史演义小说，象『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的书，也是大家所欢迎的。这一类书范围既广，故事性也强，如果观点正确，写作技巧好的话，也能给予群众一定的历史知识和阶

級斗争的教育。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知识，在新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没有出来以前，是否可以考慮重印一些比較可取的旧的演义小说呢？我看是可以的。这里特別提出来谈谈蔡东藩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五百万字以上的历史演义，他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〇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全书共十一部，一千〇四十回。計有：

前汉演义	(原名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	一〇〇回
后汉演义	(原名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	一〇〇回
两晋演义	(原名两晋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南北史演义	(原名南北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唐史演义	(原名唐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五代史演义	(原名五代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宋史演义	(原名宋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元史演义	(原名元史通俗演义)	六〇回
明史演义	(原名明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清史演义	(原名清史通俗演义)	一〇〇回
民国演义	(原名民国通俗演义)	一二〇回 另有許廣文續的四十回

這十一部書不是在同一个時間出版的，作者也不是順着朝代次序寫的。最先寫的是『清史演義』，出版于一九一六年。按成書的次序：

一、清史 二、元史 三、明史 四、民國 五、宋史 六、唐史 七、五代史
八、南北史 九、兩晉 一〇、前漢 一一、後漢

寫完最後一部『後漢演義』，已經到了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陸續印行這十一部演義，都是有光紙石印插圖本，當時這部書的銷行量非常大。到一九三五年，會文堂新記書局又把它全部改為鉛印本，加上許廣文續的『民國演義』四集四十回，总的書名稱『歷朝通俗演義』，分裝十四冊。另刊『歷朝通俗演義改版印行緣起』一冊，把全書的序文和每部書的回目搜集在一起。

蔡東藩先生在十一、二年的時間內，連續寫出了十一部演義，字數超過五百万，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有介紹一下的必要。

蔡東藩，名嶧，浙江蕭山臨浦鎮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九。蔡東藩二十歲前已中秀才，清末以優貢生朝考入選，分发江西省以知縣候補。他到省不久，因看不慣官場習氣，稱病歸里。辛亥革命前一度入福建，亦不久即歸，一直住在臨浦鎮家里。他在『中國歷代演義』中常自称作于臨江書舍，臨江即浦陽江在臨浦一帶的別名。

蔡東藩在辛亥革命前著過什么書，我們還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寫了一部『中等新論說文範』，這部書由上海會文堂書局出版，題古越蔡嶧著述，邵希雍評校。邵希雍字廉存，號伯棠，山陰人，是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暇借文字，陶鑄国魂，予語之曰：『此所謂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銷以万計。本年夏，予游閩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煩，不遑廢綴，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譖陋，当以未能諭。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屬稿，而三戶聞已兴起矣。就時論事，勉成數十篇，并綴數語以作弁言。窃謂为新國民，當革奴隸性；为新國文，亦不可不革奴隸性。前此老師宿儒，終日咿唔案下，專摹唐、宋諸大家文調，每下筆，摭拾古文一二語，即自命為韓、柳，為蘇、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絕非所問，是謂之优孟學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謂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則舉報紙拉雜之詞，及道听途說之語，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謂之盲瞽學也可：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隸性者也。夫我伸我見，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詞純，明白晓暢，以發揮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之精神，为新國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奧，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说明了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况。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閩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語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誚我也。』余曰：

『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察，余当贊之，附以总评，概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誼，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請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問世了。

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頌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騷，聊以自慰。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記得他編节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費，这种低廉的稿費，替会文堂換来了大量的財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鉛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沒有請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于連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細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順序写到民国的。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剝削和无視，实在是不公平的。這位給我們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沒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鎮淪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應該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編制体例。

『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崑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崑三人工作集于一身。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繁杂，要写成一部联貫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象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貫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記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統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數。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都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統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記載一样，是站在統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一千〇四十回、五百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統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解释名詞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詞下都注明是那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鑑』的旧例，对读者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

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这种注分量比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分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沒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辨，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绕好望角直至呂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績，不亞西洋哥伦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只能说迎合一些低級趣味，成了本书的疵累了。

总批是每一回結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結構，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象史论，借以发抒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些还有可取，有些是應該否定的。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

『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类比較可信的历史記載，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沒有而且也不主张象一般演义小说那样用虛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演义，不过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象『三国演义』，大家已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虛構』（见章学誠『丙辰札記』），总算和史实不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貫中的写法。他在『后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輯『三国演義』……风行海内外，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罗氏『三国演義』当作『三国志』相看。……小子所編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嘗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謂我迂拘呢！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誠『丙辰札記』所说：『实則概从其实，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实錯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謂不謀而合。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緯，不尚虚誣。徐懋功（勑）未作軍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拔死，烏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宁若妖魔？……則天淫秽，不聞私产生男；王环伏誅，怎得坂眞圓耦？种种謬妄墮穢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虛、烏有諸先生，諒无从窃笑于旁也。

『宋史演义』序亦云：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約荒唐者多，確凿者少。龙虎爭雄，并无其事；狸猫換王，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庞籍非怀奸之相，殿出不经。岳氏后人，不聞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喪身？种种謬談，不勝枚举。而后世則以訛传訛，將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問先民之輯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誣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諷諭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点

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这是所謂历史小说，也不能純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記載写的，史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須决定采取一种說法。大概一般的問題，他只是根据比較可信的史书來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象『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請到了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馬荐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諸葛傳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諸葛亮傳詳載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敗后，且庶母亦不聞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義』十七回吐谷渾伏允自經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鑑」。』『宋史演義』三十七回知广德軍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家。但據王偁『東都事略』、蘇軾『志林』皆云壽昌三歲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鑑考異』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工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視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謂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沒有記載，而由演义小说虛构出来的事情，

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搏之死，有云：

陈搏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沒有一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的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著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閃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暴厥，一命嗚呼。或说由光义謀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如何致死，旁人无从覩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紀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遺命及她影斧声諸傳聞，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將正史野乘，酌录數則，任凭后人评论吧了。

从这三种情况来看，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貴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知识分子，沒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問題，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象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問題，明朝人谈得很热闹，象『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諸臣及飘泊经过，繪影繪聲，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問題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

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鳌、陆树声、薛应旼、郑晓、朱国桢等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訛，亦未必尽由附会。

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們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而知。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們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恥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頤行乐，不顾恥。……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恥者。夫无一誓雪国恥之人，是終于无恥者也。我不敢謂此終于无恥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謂此終于无恥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張，鉴吾国民之不复知恥，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悶。随着时勢的发展，这种苦悶越来越深，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搘，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約法』，絕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聞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此則犹是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国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